

空间主体论视域下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思考

段进军¹,付双双²

(1. 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2. 苏州大学档案馆)

摘要:空间主体论把个体行动作为逻辑起点,强调了行动、规则、空间之间深层的逻辑关系。从空间主体论视角可以展开对人文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深度思考:其一,“行动人”假设把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将经济学导向了差异空间观,而“理性人”假设则把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排斥出去,主流经济学只有同质的空间观,而没有差异的空间观。差异空间与人文经济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二,“行动人”是思考人文经济学理论内涵的逻辑起点。个体行动及其协调生成了“空间性”和“地方性”,两者一旦生成,便会对个体观念和行动产生深刻影响。不同“地方性”之间的融合与交流形成了具有不同“地方性”的“节点-网络”式的空间体系,区域开放才能推动“地方性”不断演变,而封闭的“地方性”是没有生命力的,并将制约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三,在空间主体论视角下,人文经济实践要做到对一般性规则的尊重,对规则的尊重就是对人的尊重;要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重塑“地方性”,探寻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要高度重视人文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这三大创新的逻辑关系,通过人文创新推动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要以硬实力、软实力和暖实力“三个力”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即除了有制造业为主的“硬实力”,还要有发展人文经济的“软实力”并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的“暖实力”。

关键词:空间主体论;人文经济;个体行动;一般性规则;地方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1]目前学界主要从各自学科出发,围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含义、学理阐释、实践样本等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如,马克思主义学者自上而下,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新时代人文经济

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精华^[2-3];只有从文明体系和文明形态,尤其是中华文明的角度出发,才能构建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经济学^[4];要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并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提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建构路径^[5-7]。与此同时,经济界的学者更多是从推动经济和文化相互融合角度出发思考人文经济学理论内涵,如洪银兴提出,人文

引用本文:段进军,付双双. 空间主体论视域下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思考[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28(1):42-4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19JJD90008)

作者简介:段进军(1968—),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文经济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745806859@qq.com

经济学既不是人文学科,也不是经济学科,更不是要求建立新的学科,而是对人文与经济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理论和实践,其内在逻辑是“文化-人-经济”,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经-以经育文”^[8]。关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实践样本,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州和杭州的实践经验上,着重探索这两座城市在推动人文与经济融合方面的成功做法^[9-10]。本研究亦认为,人文经济学需要探索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以解决进入新发展阶段所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笔者在《“行动-规则-空间”三维视角下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思考》一文中,在反思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对“理性人”假设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行动人”假设,以真实的“行动人”假设推演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对人文经济学理论及实践的思考^[11]。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行动-规则-空间”三维理论范式升华为空间主体论,以更加强调整体行动作为思考人文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特别提出了个体行动及其协调所形成的分工与合作推动了“地方性”的形成,而“地方性”一旦形成,将对个体行动及其协调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理论观点对于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个体行动与差异空间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推动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形式化,把经济学简化成数学问题,变成了一个只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问题,把人的行动排斥到经济学理论之外^[12]。主流经济学并没有考虑到人的行动及行动协调问题,其研究的只是一个“理性人”面临的确定世界,而不是一个多人的世界,因此不存在一般规则去协调人们的关系,更不会有人的行动及行动协调所生成的差异空间概念。主流经济学的空间观是均质的空间观,仅仅把时间纳入其中,这样就对现实世界缺少解释力。然而,现实空间是有差异的,空间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与社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空间就是社会,社会就是空间,差异空间的舍去就等于将个体行动及行动

协调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舍去,这与20世纪之前整体社会科学发展方向是一致的。“空间在以往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态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3]20世纪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这一发展路径。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经济学打算加以解释的活动,涉及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它是有关人们为解释如何最有效地为不同目标而发现和利用不同手段的理论。”^[14]哈耶克同时指出:“人类独特的成就,即导致他的其他许多突出特性的成就,在于他的差异和多样性。除了少数物种因为人类施加的人为选择而产生具有可比性的多样性外,人类多样性无与伦比。”^[14]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最重要的就是承认现实的多样性与个体行动的多样性,把人的自由选择 and 自由意志融入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将人的行动置于社会关系之中。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所形成的分工与合作问题,是古典经济学揭示人类活动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创造财富的密码,也是人类文明的底层逻辑,舍去了人的行动和行动协调(分工合作),根本无法理解空间内涵及其差异性。离开了差异空间,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人文经济学。

人的行动的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是一致的。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理性人”假设,该假设把人变成了投入和产出的机器,它没有“手段-目的”、没有自由意志,不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行动人”,自然,其所塑造的空间是均质的空间。人的行动及其协调是理解差异空间最重要的基础,是人的行动及其协调推动了差异空间的形成。大量微观个体的行动及协调博弈形成的像价格、私有产权、货币、法治等一般性规则,又协调着不同个体的行动。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集聚所形成的增长极。克鲁格曼主要从规模报酬递增的角度解释了区域中心的形成^[15]。段进军认为,个体行动及其协调趋于向空间集聚,集聚所形成的增长极会更加有利于个体对分散知识、默会知识的利用等^[11]。同时,个体行动及其协调向空间集聚的过程也会生成协调个体行动的一般性规则、制度和文化,而且又对个体行动及其

协调具有强大的反作用。长期以来,增长极是作为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是作为生产要素和产业等“物”的集聚地,但其也是推动制度规则、文化生态等生成的重要原因。经济系统、制度规则和文化生态是高度统一的,共同耦合叠加形成综合性增长极。从个体行动及其协调视角去思考增长极,就赋予了增长极(空间)经济、制度和文化耦合的内涵,把对空间的思考从物的维度拓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更多维度。

增长极及其衍生所形成的空间体系对于解释区域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工业化以后,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经济文化集聚辐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统帅和灵魂、是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社会-空间”辩证法及历史、空间、社会三元辩证法,就是把空间提升到社会发展的本体论高度,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赋予了空间在社会发展中的内生动力^[13]。哈维等诸多学者主要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空间扩张角度及宏观层面去思考社会发展,其开创了思考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逻辑向度,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角度去思考社会经济发展^[16]。笔者认为,没有个体行动及其协调就很难理解“空间性”和“历史性”的概念,这里的“空间性”就是上文提到的基于经济、规则、文化耦合的增长极所表现出的综合性特征。不理解“空间性”,根本无法理解人文经济的内涵,但若从更为本体的角度来看,个体行动应成为比空间和时间更为重要的逻辑起点,因为个体行动具有重要的先验性。个体行动及其行动协调塑造了不同的“空间性”和“历史性”,而“空间性”和“地方性”一旦形成,又会推动个体的行动及其协调。

人文经济发展必须强调个体行动的重要性,强调协调个体行动的一般性规则的重要性及由此延伸的“空间性”“地方性”的重要性。研究人文经济必须赋予其空间维度,要高度重视空间及“空间性”的概念。行动、规则、空间这三者是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但个体行动是作为逻辑起点的。因此,为进一步强调个体行动的本体性,将“行动-规则-空间”三维理论范

式升华为空间主体论,以进一步深化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涵思考。

三、空间主体论视域下对人文经济学的思考

1. 空间主体论的提出

朱海就在奥派经济学家米塞斯“人的行动”理论和哈耶克“一般性规则”即“规则理性”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行动-规则”理论范式,该二维理论范式是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理论的一个综合^[12]。该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是把微观个体行动与宏观社会经济秩序即自发秩序统一起来,突破了“理性人”的概念,从“行动人”视角建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这种体系赋予了经济学个体行动的内涵。本研究认为,应在“行动-规则”二维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延伸为“行动-规则-空间”三维理论范式。奥派经济学很少提空间及“空间性”的概念,忽视了“空间性”对个体行动的强大反作用。它特别重视时间对于人的行动的重要性,这可能是经济学(包括奥派经济学)受到当时社会科学“历史性”的深刻影响,当然,这一点在朱海就教授提出的“行动-规则”二维理论范式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个体行动选择,首先选择具体的空间区位,行动和行动协调必然是在具体的空间维度展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塑造着地理空间,形成经济、制度、文化等耦合的“空间性”和“地方性”。离开了空间维度,就很难理解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分工合作),反过来,空间也是辩证的、鲜活的,“空间性”和“地方性”会深刻塑造个体观念,从而极大影响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哈耶克提出的情景知识、默会知识都有具体空间维度,特别是其提出的市场扩展秩序,更是一个动态空间观的体现,本质上就是一种动态的空间过程。同时,哈耶克强调了竞争过程是一个发现知识和信息的过程,这也内含着一种空间维度。然而,其忽视了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即分工合作在空间上表现的动态集聚过程,且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的集聚效应和分工合作效应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同时也会表现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忽视了个体行动所形成的“空

间性”和“地方性”对个体行动和观念的巨大反作用:没有城市空间集聚和辐射,就很难产生城市灿烂的文化,特别是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文明;没有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所推动的空间集聚和扩散过程,就很难产生经济、规则、文化耦合的“空间性”或者“地方性”。而“空间性”和“地方性”一旦形成,又会对个体行动产生强大的反作用。

因此,尽管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奥派提出了“人的行动”概念,同时也注重人的行动协调(一般性规则),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不能就此止步。因此,笔者创新性地提出了行动、规则、空间深层作用的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良性互动的非线性关系。同时,本研究也认为“空间性”和“地方性”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和文化的系统耦合,超越了把空间仅仅作为一种容器形式而存在的观点。对空间的理解不应该局限于物质经济层面的要素产业的集聚,而是要深入到制度层面,更要深入到文化层面,要从经济、规则和文化耦合的“空间性”和“地方性”思考空间,这在今天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尤为重要。“空间性”和“地方性”是个体行动及其协调演化生成的,一旦生成,就不能忽视其对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所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因此,研究人文经济学不能忽视“空间性”或者“地方性”,没有“地方性”或者“空间性”,人文经济学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离开了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又难以理解“空间性”和“地方性”的演化生成,人文经济学就变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在个体行动与“空间性”之间必须有一般性规则(这里的一般性规则就是指价格、产权、法治等,其是大量微观个体长期博弈所形成的)。总之,发展人文经济可从两条路径思考:一条是其逻辑起点,即个体行动要通过一般性制度规则的建立推动个体行动及其协调,推动“地方性”的形成及演化;另一条是通过建立开放的“地方性”和“空间性”来反推个体行动及其行动的协调。但无论哪一条路径都殊途同归,即回到个体行动及其协调。因此,个体行动是最根本的本体,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创造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为进一步强调个体行动重要性,将“行动-规则-空间”三维理论范式简称为空间主体论。

2. “节点-网络”空间体系的形成

人文经济学的发展不是浮在空中的,而是具有空间维度,舍去空间维度就很难理解人文经济学的内涵和实践。既然不能离开空间维度,那就要对“地方性”和“空间性”展开深入思考。苏杭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空间?除了时间历史层面的解释,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个体行动和空间维度。从空间主体论视角思考人文经济发展,必然会赋予人文经济开放和演化的特点,在开放和演化中实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出了城市的多样性,认为新思想是结合旧思想而形成的,城市的“大熔炉”混合了很多不同的产业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城市交往活动频繁,使来自不同地方的思想相结合,从而产生经济增长和文化的演变^[17]。从纵向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维度来看,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包括苏杭),无一不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地方。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个体行动协调博弈出一般性规则和文化生态,推动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在更大空间中形成,即哈耶克所讲的市场“扩展秩序”,但这个“扩展秩序”应拓展到文化和制度层面。因此,发展人文经济不能仅仅局限于特定封闭的界限,必须放在空间扩展的秩序中,放在开放的“流空间”中,并在此空间中去塑造基于人文经济发展的“地方性”和“空间性”。如“东亚四小龙”创造的奇迹,就是由多元文化交流融合所推动的,在融合中赋予了原有文化基因新的元素,开放交流融合才能更加凸显其独特的“地方性”和“空间性”。

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不乏封闭的“地方性”和“空间性”,封闭的“地方性”和“空间性”意味着集权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很难有人文精神及由此推动的人文经济的存在。只有在一般性规则的基础上,才能推动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也才能产生人文经济,否则就不是人文经济,因为其未能尊重一般规则,不尊重一般规则就很难尊重个体的行动。

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融合,推动“节点-网络”式空间体系的形成。在这个网络关系中,不同节点的“地方性”并没有消失,反而在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元素,进一步推动文化生态不断发展演变,在交流融合中生成新的“地方性”和“空间性”,这种“节点-网络”可理解为空间扩展的秩序。在不同文化基因的“地方性”之间建立一种对话机制和一套共同规则体系,人类从点状孤立空间走向了空间节点相连的网络演化过程,甚至从单一物理空间走向实体与虚拟相融合的空间,但最终不是走向趋同,而是实现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空间扩展秩序最后不是变成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不同“节点”在多维度链接过程中不断推动“地方性”和“空间性”的演变。研究人文经济,一定要超越单个行政区域的封闭思考,要在开放网络交流中进行思考,要把人文经济看成一个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

3. “地方性”对个体观念和行动的塑造

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所生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就像磁场一样反作用于每个个体及其行动,其最重要的就是影响区域中个体的观念。强调个体行动的重要性,就必然要重视观念在人文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观念是经济发展或者说人文经济实践最深层的源动力,若人文经济的发展没有表现在观念层面,就很难化成一种物质力量,因此,研究人文经济必须击穿物进入人的观念层面。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中将文化氛围或创新文化生态体系置于一个创新经济体系的核心,这在传统经济学里非常少见。迷恋实证经济学的学者往往认为文化“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实证,难以成为解释任何经济现象的变量。然而,任何深入研究硅谷和其他创新活力中心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文化生态系统才是创新活力之源^[18]。费尔普斯其实就是强调硅谷等区域的“地方性”对个体行动特别是创新观念的巨大影响。麦克洛斯基提出:“解释经济大爆炸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普通人全新的自由和尊严,其中就包括了创新的资产阶级”^[19]。此外,“资本和制度都不是我们财富的来源,这些都是次要的且具有依赖性的因素,是人人平等这

一理念的广泛传播促成了经济大爆炸。人类思想表现在言语、书信和文学中,人文学科对此进行了研究,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工具在我们理解经济大爆炸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创造世界的不是我们首先想到的蒸汽机和大学,而是平等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思想。”^[19] 麦克洛斯基同样强调了个体平等主义观念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观念在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忘记其空间维度。观念总是与一个地方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的演化所形成的“地方性”联系在一起的,若从真实的行动人出发,就可以突破经济学单单从物的层面出发,因为对人的行动最大的影响就是观念,而“理性人”是无法与观念相吻合的。个体观念与“地方性”和“空间性”联系在一起,由于受到海洋文明的影响,深圳、杭州、苏州等发达城市都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区域,同时也有不同的“地方性”:人是文化的载体,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不同文化在这个区域交流融合,使得深圳成了我国创新力最强的城市之一;杭州孕育了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及“六小龙”等创新企业,这与浙江的文化基因是分不开的,因为永嘉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以事功学说为根基,强调经世致用、义利统一,主张学术研究需解决现实问题,反对空谈道德性命,这对浙江人的行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苏州自然条件优越,是一座儒雅的城市,近代以来江南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实业、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苏南模式新文化更是激发营商环境活力之源^[8]。除了强调“地方性”对该区域个体观念的影响,也要强调个体行动对“地方性”和“空间性”的塑造。米塞斯认为:“一些人类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开始的,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那么人类的进步都会就此中止”^[20]。米塞斯这段话也说明,一些具有超前观念的伟大个体对于大多数人的观念和生活

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引领。毫无疑问,这些个体观念对于塑造“地方性”是极为重要的,如南通张謇对于南通城市文化的影响、荣氏家族对于无锡城市商业基因的塑造等都是突出案例^[11]。总之,在强调“空间性”和“地方性”对个体观念塑造重要性的同时,也要强调个体行动对“空间性”和“地方性”的塑造,“空间性”和“地方性”具有独特性,但“空间性”和“地方性”中包含着一种普适性和普遍的规律性,这是不同“空间性”和“地方性”交流融合的基础。

四、空间主体论视域下对人文经济实践的思考

1. 对一般性规则的尊重

从空间主体论的角度思考人文经济学实践,就能深刻洞察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本质。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是思考人文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个体行动和自由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其根本在于我们尊重了个体行动;尊重了企业家的创造力;尊重了价格、私有产权、法治等最基本的一般性规则。在此基础上,尊重市场是创造财富最为重要的机制,并尊重个体行动及其协调所生成的分工合作的秩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不断完善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特别是发展模式呈现“政府主导+市场活力+后发优势”的鲜明特征。米塞斯强调要从主观角度看个人的需要、目的和手段,从每个人主观角度提出,允许个人有着最大“目的—手段”自主选择空间的社会,也会是财富最多的社会;个人心智和行动本身就创造财富^[20]。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人文经济最重要的动力,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发展人文经济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步入后物质化时代,必须尊重每一个微观个体的行动和自由选择,尊重每个个体的创造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人文经济的要义所在。

2. 以深化改革开放重塑“地方性”和“空间性”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社会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低效率

空间扩张和蔓延等问题。从空间主体论视角看,空间就是社会,空间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产物,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生成了一种“空间性”和“地方性”。“空间性”和“地方性”深刻地影响个体行动及其协调,也深刻地影响个体观念。城镇化过程中,空间转型的重要方向就是重塑“地方性”和“空间性”,赋予空间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本质、赋予空间一般性规则的内涵、赋予空间文化生态的内涵,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要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重塑“地方性”和“空间性”,赋予“地方性”规则内涵、文化内涵及开放内涵,封闭的“地方性”和“空间性”是没有生命力的,这是回到“以人为本”的客观要求,这也是从“空间主体论”视角思考空间转型的重要选择。苏杭的发展揭示了开放交流对于“地方性”塑造性的重大意义。在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中,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相互交流,很多北方城市学习南方的城市建设、招商引资、营商环境建设及城市文化发展的经验,在相互开放所形成的网络中,南方发达城市的一些观念、理念及市场规则等深刻影响北方城市的个体行动,重塑着北方城市的“空间性”和“地方性”。从“空间主体论”视角去理解空间本质,就避免了将空间当成一种手段,走一种空间大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是转向一种重塑“地方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思考城市空间转型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为此提出以5D的理念思考未来的“空间性”和“地方性”: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Division(分割)、Digitalization(数字化)、Differentiation(差异)。5D就是提升密度,提高城市发展的集聚度;缩短距离,加速交流交换和交融;消除分割,提升一体化程度;突出差异品质,增强不可替代性,重塑“地方性”;加快数字化,实现虚实融合发展。5D理念的背后逻辑就是推动更加统一市场空间的形成,推动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开放,在统一市场中才能更好地重塑“地方性”。

3. 要通过人文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从个体行动出发,任何时候都要认识到,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人是有思想、有意识、有价

值观偏好的主体,因此,人的观念创新是最为根本的。没有文艺复兴就很难有工业革命。没有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以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及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运动。因此,人文创新驱动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激活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再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三大创新的逻辑关系理清以后,当前发展人文经济的重大意义就呈现出来了:发展人文经济就是要通过三大创新的递推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就是个体,人是一个观念体,对人的行动最大影响就是观念,而观念来源于人文创新,人文创新取决于“空间性”和“地方性”,“空间性”和“地方性”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对于一个城市和区域的制度创新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制度创新又深刻地影响着科技创新。三大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从个体行动出发,所有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释放个体的创造力并推动创造力整合。总之,个体行动及其协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4. 以“三个力”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

在新一轮全球化中,要立足于“三个力”,即“硬实力”“软实力”“暖实力”。以人文经济的视角思考新一轮全球化,预示着进入新阶段,全球化可能不再是“中国制造”,而可能是“中国创造”“中国智造”“中国品牌”“中国智慧”等,将会融入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主动推动全球化的一种强大动力。对中国来讲,“硬价值”全球化时代结束了,要切换到“软价值”的新阶段,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新动力,进一步改革开放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深挖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树立文化自信,又要在与世界先进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不断发展科技文化,释放人的创造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精神层面的需求,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化过程中,应按照空间主体论的视角,更加开放地去思考人文经济学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人文经济学所揭示的内涵则既具有

中国特色,也应具有重要的普适价值,中国只有融入世界,在与不同区域空间的分工与合作中才能形成竞争优势,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必须遵守一般性的规则,这种共同价值和规则是人类文明所共有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除了具备以制造业为主的“硬实力”,我国更要具有发展人文经济的“软实力”及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的“暖实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跨国跨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

五、结 语

人文经济发展需要激发个体的创造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新质生产力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人文经济学时代命题的要义所在。人文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的理论去指导人文经济的实践,从空间主体论这一理论视角出发,以个体行动作为逻辑起点,提出“地方性”这一重要的概念,建立个体行动与“地方性”之间深层逻辑关系,对于建立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并推动人文经济学实践应用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杜尚泽,潘俊强.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N].人民日报,2023-07-10(01).
- [2] 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发展范式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1):11-19.
- [3] 任平.深化理解和把握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自觉[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4):21-30.
- [4] 樊浩.人文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学”?[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1):5-14.
- [5] 刘亚秋.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文性路径[J].新视野,2023(1):46-54.
- [6] 逢锦聚.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和方法[J].经济研究,2023,58(8):4-14.
- [7] 桑明旭,徐星美.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基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39(1):126-140.
- [8] 洪银兴.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人文经济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

- 科学),2025,62(1):5-18.
- [9] 任平,李扬,战焰磊,等.人文经济学: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笔谈)[J].探索与争鸣,2023(9):144-158.
- [10] 罗卫东,蓝蔚青.人文经济发展的城市样本:杭州的探索与实践[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6(5):88-100.
- [11] 段进军.“行动—规则—空间”视角下人文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3):9-18
- [12] 朱海就.真正的市场——行动与规则的视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
- [13]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4] 金碚.新盛时代,本真复兴——金碚新论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
- [15]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16]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17]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18] 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19]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糟糕的经济学[M].朱源,徐坤,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2.
- [20] 冯兴元,孟冰.创造财富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4.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ubjectivism / Duan Jinjun¹, Fu Shuangshuang²(1. Center for Chinese Urbanization Studies, Soochow University; 2. Soochow University Archives)

Abstract: Spatial subjectivism takes individual action a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emphasizes the underlying log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action, rules, and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ubjectivism,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First, the “rational man” hypothesis excludes individual action and action coordin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conomics, resulting in a homogeneous view of space. In contrast, the “action man” hypothesis incorporates individual action and action coordination into the economic theory, steering economics toward a differential spatial view. Differential space is inherently link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Second, the “action man” hypothesis serve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contemplating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ndividual action and its coordination generate “spatiality” and “locality”. Once formed, these concepts profoundly influence individual perceptions and actions. The integration and exchange of different forms of “locality” create a spatia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node-network” structures with distinct forms of “locality”. Regional openness drives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locality”, while a closed “locality” lacks vitality and constrains loc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ubjectivism, the practic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must respect general rules, as respecting rules equates to respecting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reshape “locality” through further reform and opening-up, exploring endogenous drivers for local development. Significant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innovation: humanistic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umanistic innovation should driv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hile the latter should prope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 new round of globalization should be advanced through “hard power” “soft power”, and “warm power”. This means that in addition to “hard power” centered on manufacturing, there must also be “soft power” in developing humanistic economics and “warm power” in respecting the culture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Key words: spatial subjectivism; humanistic economics; individual action; general rules; locality